

閒話 文人

胡風・巴金・沈從文
老舍・趙清閣
徐悲鴻・孫多慈
蕭乾

常玉
蔣兆和
馬衡
常任俠

薛原・著

聶紺弩
石魯
陳子莊

田家英
柯靈
蜀思聰



閒話

文人

薛原・著

閒話文人

作 者 / 薛 原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邵亢虎

圖文排版 / 陳宛鈴

封面設計 / 王嵩賀

發 行 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 年 7 月 BOD 一版

定價：34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代序】

在書房裏發呆

壹

記得周作人說過的話，大意是自己的書房不能輕易給別人看，因為一個人的書房最容易讓人看穿自己肚子裏的貨色，藏不住假。這點對大洋彼岸的人來說，涇渭不同，長毛番鬼恨不得到處炫耀自己的書房，即便沒有多少藏書，也要製造一些假書——譬如櫥門裝飾著以假亂真的一排排書脊。譬如案頭的一冊大而精美的《坐擁書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內中所收的幾乎都是美國的文人和經理人的書房，先不說其書房的大和壯觀，即便是書架上的陳設，看上去真是「收藏」，即便書房主人說藏書為了實用，看上去也顯得豪華。從各個不同身份的書房主人的自述裏，藏書雖有種種不同，風格也雖然不同，但有一點相似，就是都貫穿一個主調，突出藏書和生活的和諧，而且都希望自己的書房讓外人看上去是獨一無二的，話語中充滿著炫耀和自豪。不過看著他們的書房，也不得不說，那些書房的確值得驕傲，大洋彼岸的書房是我輩無法企及的。

與《坐擁書城》相比，《我的書房》（嶽麓書社 2005 年版）是當下中國文人的書房，一頁頁翻下去，也有一相似點，就是大多強調書房的狹窄或來之不易，往往文人們的住房擁擠不堪，書房和客廳甚至臥室往往多種功能混用，即便是有了一間屬於自己的書房往往也是到了老年。而對於自己書房和書架的陳設也往往以樸實無華為第一選擇，別說豪華和壯觀，即便是裝飾，也惟恐給人留下炫耀的印象。這一點

和大洋彼岸的「同行」真是兩個極端。書中所收的五十多個文人的書房，幾乎代表了當下文人的典型，不管是大是小，應該說，文人們的態度是一致的，書房是自己的精神的依託，也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底氣」。

兩年前在上海，有緣拜訪一間位於永嘉路「慎成里」老石庫門房子裏的書房——「兩步齋」，顧名思義，「兩步」是說其小，書房裏最大的特色就是書櫥裏和桌面上的一摞摞檔案袋，裏面都是主人採訪的資料，這也體現了主人的特點，以人物傳記的寫作為主，檔案袋裏所放的都是所寫人物的材料。「兩步齋」主人丁言昭，其所寫人物有一特點，都是現代文壇圈裏圈外的「才女」，而且大多和她有著直接的聯繫，譬如上海的陸小曼、王映霞，北京的丁玲、冰心……不過，她筆下的這些才女，陸小曼和王映霞更生動親切許多。這樣的書房也實在反映了主人的生活。

我也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書房，從最初書房、客廳和臥室共用一室，到現在有了獨立的書房，應該說實現了有一間自己的書房的夢，但也像許多朋友一樣，現在卻很少在書房裏讀書了，在書房裏更多是為了找書的苦惱和發現的樂趣，而讀書卻移到了客廳裏——客廳儼然也成了書房的延續。書房於我更多成了「發呆」的角落。在生活裏給自己留一間「發呆」的書房，也是「生活在別處」的樂趣和夢想的源地。

貳

我喜歡在書房裏發呆。坐在那兒，並不看書，而是用散漫的目光四周打量著或整齊或擁擠或雜亂的書陣書堆，就像抽煙的人吐著一個又一個煙圈看它們漸漸瀰漫開來愜意地陶醉，或像喝酒的人端著酒盅小口小口地呷著麻醉自己的神經。夜晚寂靜的書房，給了我安逸，也給了我迷惘。有時候我不知道是我在看書還是書在看我，我和書就這樣相互對視著，一點對接有時剎那間碰撞出了火花，又讓我驚喜，也

讓我驚醒，更讓我感到了自己的存在。書與人，人與書，在對視中悄然消磨了春夏秋冬。有時，拿起一本書並沒有理由。也許因一本書，又翻起了另外幾本相關或不相關的書。書裏書外，整個人便坐在那兒發起呆來……

譬如某個週末的夜晚，在書房裏偶然聚攏了我的目光的那幾部已有些褪色的綠皮書：上海譯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接連翻了幾本陀氏作品的扉頁（因為我有在上面記錄買書情景的習慣），我突然發現，1986年簡直是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一冊上海譯文版的《罪與罰》（1979年初版，1985年8月第8次印刷），緊貼著書脊頂端的透明膠紙已泛著深黃。在扉頁上，留著當初買書的記錄：「1986年12月3日購於滬」。是在從廈門返青島的途中在上海轉車，在書店裏偶然見到了這本《罪與罰》，櫃檯後的女店員遞給我這本書，不湊巧的是書架上只有這一本了，書脊頂端破裂了，一位老店員從姑娘手中接過去說，補一下就沒事了。那時，我正迷戀陀氏的作品，這套上海譯文淺墨綠的陀氏作品集，我幾乎見一本買一本。《少年》（1985年9月初版），我的記錄是：「1986年夏購於四方」。再如《死屋手記》、《被侮辱與損害的》、《白癡》也是在八六年買到的。其中，1986年8月初版的《白癡》我是「1986年11月27日購於廈門鼓浪嶼」。看著這些買書的記錄，恍如隔世。八六年秋天我第二次去廈門，從上海轉車簡直就是災難，至今想來上海火車站售票視窗的擁擠不堪仍歷歷在目。從上海到廈門，在火車上我幾乎站了一路，當時的總行程大約二十多個小時，我站了十六個小時，真是刻骨銘心。後來火車到了一站停車，我感覺那火車仍在轟轟地行進著。回程時雖然更擁擠不堪，但我有了一個座位。不過快到杭州時，上來一位抱孩子的年青女人，就站在我邊上。最後的結果自然是我站了起來。

這套陀氏作品集我最先買的是兩冊本的《中短篇小說》（1983年6月初版），八四年夏天在青島中山路的新華書店裏意外買到的。最初對陀氏的認識是讀初中時從報亭裏買到的一本雜誌，雜誌名已記憶模

糊，彷彿是《俄蘇文學》之類，封底是一幅陀氏在書房裏的木刻版畫，雜誌裏有陀氏的紀念專輯，其中有一個短篇小說叫《小英雄》，正是這篇並非陀氏優秀之作的短篇小說，引起了夢中關於異性的幻想，並讓我牢記了這個「病態」的作家。當我在書店裏見到他的《中短篇小說》時，沒有絲毫猶豫便買了下來。但讀這兩冊書的結果，是我被《窮人》打動了，並迷戀上了陀氏的作品。八六年在青島的暑期圖書博覽會上，也就是後來的特價書市，我意外淘到一本小冊子：《回憶陀思妥耶夫斯基》（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7 月初版），定價九角三分，又打了半價，簡直是白揀。這本小冊子是陀氏夫人的回憶錄，從她的回憶中，陀氏的形象牢牢刻在了我的印象中。後來我在北大校園裏北大出版社的門市部裏雖然買到了新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憶錄》（「1988 年 3 月 5 日於北大。」），但讀起來仍沒有那本小冊子親切。

在 1986 年我買了第一本外國作家評論集，這就是封面上標明（蘇）葉爾米洛夫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5 年 2 月新一版），滿濤譯，定價一元二角五分。正是這本書，讓我對陀氏的作品有了大概的瞭解，也有了要買齊他的作品集的念頭。買此書是和一本陀氏的小冊子一起，即收入人民文學版《文學小叢書》中的《白夜·舅舅的夢》（1985 年 3 月初版）。在這本小冊子上還留下一行字：「1996 年 10 月 26 日整理藏書」。對此，我已印象全無。

一部厚厚的格羅斯曼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外國文學出版社 1987 年 8 月初版）的扉頁上則寫著：「1988 年 9 月 20 日購於溫州」。這勾起多少記憶，夾雜著桂花的濃香。是在溫州郊外一個叫白象的小鎮，一座不高的山嶺和一座廢棄的廟宇，溫州地震台所在的庭院裏，在那裏我呆了三個多月，中秋節時，院中的桂花樹已濃得醉人，一大早趕到白象鎮乘車去了溫州，在溫州新華書店遇到了這部傳記。於是，接下來寂寞的日子裏，我追蹤著陀氏的身影在時間的河裏逆流而上。那個沉浸在輪盤賭中不能自拔的神經質的癲癩病人始終在我眼前，講述著他所遇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白癡、瘋子、放高利貸人、妓女、臨

刑的殺人犯，當然，還有他年青善良的妻子。轉過年來，我就買到了《賭徒》：「1989年3月5日購於青島古籍書店。」

在人民文學版的《罪與罰》（1982年10月初版，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的扉頁上，記錄著「1989年9月3日午於青島台東書店」。此書插在那些上海譯文版綠色的陀氏作品集中顯得突兀扎眼，白色底的裝幀，封面是典型的張守義的風格：老燈盞，沒臉的人。但這部書在陀氏作品中是我讀的最多的一本，前後不下五遍。至此，買陀氏的書告一段落，接下來書店裏像是失蹤了他的身影，《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群魔》成了我的心病。後來，青島的海洋研究所圖書館處理文藝藏書，我意外淘到了兩卷本人文版的《群魔》，但這兩本舊書我一直沒放入書櫥，對待「藏書」，我有著潔癖。翻完這兩本舊書，我找來報紙把它們包了起來，放到陽臺的角落裏。後來，當我驚喜地買到新版的《群魔》時，這兩卷舊書便讓我送給了喜歡淘舊書的朋友了。譯林出版社2002年5月初版的《群魔》厚厚的像塊磚，三十六元五角，譯者是臧仲倫。在扉頁上，我寫道：「2002年6月19日午逛書城，該書久覓未得，今意外相遇，攜之盡興而歸。」陀氏最重要的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後來我有不同的版本，先是浙江文藝出版社精裝的一厚本，接著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精裝的兩卷本，後者是我1996年春在北京人文社門市部買的，上面題道：「……至『閣樓』尋訪SY不遇偶見S公。」同時買回來的還有陀氏的《書信選》。前者是該書的編輯送我的，扉頁上寫著：「1996年11月收杭州寄書。」

某年在書店裏見到了上海譯文社新版的六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封面已換成了冰冷的深藍色，沒有了舊版的暖調。看著那些熟悉的書名，起了莫名的感動。只有一本的書名陌生，這就是《鬼》。先是遲疑，接著釋然，恐怕是《群魔》的新名吧。果然。我還是挑選了兩本，一本是《白夜》，一本是改頭換面的《鬼》。在扉頁上我都寫道：「2005年8月31日於青島小書店。」其實，再買這兩本書，我已沒有了激動。

在書房裏這樣散漫著自己的目光，拿起幾本相關或不相關的書，有時讓我沉醉，有時讓我起了憂傷，譬如，當年和我一起到上海、廈門、溫州的老師中，已有三位離開了人間，送我書的那位編輯朋友也移民到了大洋彼岸，而當年我買書的青島的書店，有的也已經沒有了蹤影，古籍書店，台東書店，已成了紙上的記憶。當然，更多的時候，是消磨和充實了我的夜晚。

叁

在我醉心搜買陀氏著作的 1980 年代，其實，我更醉心搜求的還是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從他們的單本選集，到文集，甚至於全集，逐漸搜買我喜歡的作家的作品，搜羅最多的，除了魯迅之外，就是沈從文、蕭乾和周作人。一冊 1981 年湖南人民版的《沈從文散文選》點亮了尚在讀中學的我的文學夢想，而 1980 年人文版的《蕭乾散文特寫選》尤其是書中最前邊的那篇長長的代序〈未帶地圖的旅人〉給我打開了憧憬未來的視窗。高中生活的兩年裏，這兩本書成了我百讀不厭的書。就像我上邊講述的買陀氏的書，買沈從文的書和買蕭乾的書，也就各自有了長長的故事。就像有一本導遊指南，林非的一冊《現代六十家散文札記》（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0 年版）成了我的買書指南——那上邊的名單成了我的買書目標。當然，很快就發現此書名單的局限，譬如沒有周作人梁實秋等人。但 1980 年代初大量的現代作家作品的重新出版，還是很快讓我找到了他們的書。而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0 年推出的上下兩冊的《中國現代散文》，則讓我讀到了許多陌生而充滿魅力的現代散文，譬如朱自清和俞平伯的同題散文《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1981 年湖南人民版的《沈從文散文選》至今是我珍愛的一本書，其所選文章實在是沈從文的精品：《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湘西》、《一個傳奇的本事》（附錄黃永玉的那篇名文〈太陽下的風景——沈從文與我〉），還有一篇 1949 年後沈從文寫的〈新湘行記〉。這本書帶給

我無邊的想像。圍繞沈從文，我的買書漸漸形成了一個專題。某晚從《蕭乾書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中讀到蕭乾在給楊振聲兒子楊起教授的信中流露對沈從文的不滿時，大為驚訝。而從他另外的信中，也發現原來蕭沈之間友誼已經決裂，難怪在〈未帶地圖的旅人〉中不提沈從文的名字。再後來，這些作家的書，只要是 1980 年之後出版的，只要是我喜歡的作家或我覺得理應收集的作品的書，在書店裏見到後，不會空手而歸的。

某日，與幾位師友聚會，其中一位談到了他閱讀印象中的一些現代文人，譬如沈從文，他說沈先生 1949 年後遭遇不幸，生活和工作都很艱難，文革時還被迫去了幹校勞動。我好像條件反射，立即回應：你說的不確切，沈從文 1949 年後確遭遇不公平對待，但比起他的同時代的許多作家來說還是不錯的，不能說遭遇不幸，因為他是一級研究員，工資待遇還是很高的，只能說處境不好，他沒被打成「右派」，文革遭殃是那一代知識份子都如此，至於到幹校，以他的年齡和身體他可以不去，但他自己要求下去……朋友又說沈先生是書呆子，只知道搞研究。我馬上又答：沈從文不是書呆子，他很聰明，從他的書信中就能看出來，他如何找關係調動在四川「三線」企業裏的兒子兒媳回北京……朋友忍不住問我：你怎麼對沈從文如此不滿。我先是驚訝，繼而笑了，說：其實我非常喜歡沈從文。但正因為喜歡，他的書我搜集的很全，別人談他的書我也買了許多，儘管我不是現代文學的研究者，但諸如花城版和天津人民版的《沈從文研究資料》及《沈從文年譜》之類的書，也從書店裏淘回家。不過，正因為看了他的全集和相關人的不同描述，沈從文這個名字對我來說不再是單一的面貌……

肆

從 2006 年起，我也漸漸習慣了上網。作為媒體從業人員，網路已經成了我每日工作時的依賴。但是，網路只是我工作的工具，不是我

享受閱讀的工具。我的閱讀是分成不同的兩個方式的：白天在報社，網路是我工作的工具，是我獲得資信的視窗，是我尋求疑難解答的「擺渡」。夜晚，職業工作之外的我，網路不再是依賴。我仍喜歡在書房裏發呆。再發達的網路，再豐富的網路資訊，也取代不了在書房裏發呆的快樂。

前不久，一位網路上結識的朋友從海外來到青島，目的之一是來看看「書魚知小」的書房。朋友指著我書櫥裏的一排《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說：這個版本已經過時了吧？你還查閱嗎？我答：不查。她的眼光裏充滿疑惑。我又說：現在有「擺渡」，有「搜狗」。她恍然。是啊，有些書，即便不再查閱了，但看著也舒服。也許這就是「書魚」的病吧。

從一本本相關或不相關的書裏尋找翻閱得到的「發現」，與點擊「擺渡」「搜狗」迅即得到的「結果」，其過程和感受是不同的。一個晚上可能都被找書的過程浪費了，但在這浪費裏卻往往有意外的發現和愉悅。

其實，生活是需要有「浪費」來填滿匆匆流走的日子。

無邊的網路擴大了一間屬於自己的書房。

在書房裏發呆，是在關上電腦之後。

目 次

【代序】在書房裏發呆.....	i
胡風·巴金·沈從文	
同時寄出的家書.....	1
老舍·趙清閣	
「某君」與一個淡淡的女人.....	27
徐悲鴻·孫多慈	
急雨狂風勢不禁.....	44
蕭乾	
旅人的晚年.....	66
常玉	
到巴黎討口也不回來.....	91
蔣兆和	
知我者不多.....	104
馬衡	
挑盡孤燈夢不成.....	120

常任俠	
身為教授	136
聶紺弩	
身經百煉意舒平	157
石魯	
一代書生太笨	184
陳子莊	
白眼難銷貧士志	197
田家英	
書生與「小莽蒼蒼齋」	212
柯靈	
未完成的晚年心願	226
周思聰	
放不下的背簍	240
走過大學路（代跋）	260

胡風・巴金・沈從文

同時寄出的家書

壹

1949年9月17日胡風自北平給在上海的妻子梅志的信中寫道：「我應該爭取，為了工作，為了同道，這在我是一直痛感著的，但實際並不簡單，我自己的心情也有很沉重的東西，慢慢看罷。我自己在其次，現在急切的願望是一些朋友和你能夠不致因為我而使不出力量來。時代太偉大了，但因為這，每一份力量底（的）委屈在我都是難過的。」

寫這封信時的胡風來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並參加開國大典。之前和之後這一時期的家書，主要談的就是他如何「爭取」工作和內心的委曲，同時在信中囑咐梅志如何處理一些具體的出版事宜，在胡風看來，他和梅志參與的屬於私人的出版社是他們一家今後能保持獨立生活的底線，他在「爭取」工作的過程中之所以能一直不肯妥協，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他覺得有獨立生活的資本，這個資本就是他們還能自己著書和印書。對於即將誕生的新中國，胡風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他懷著自信的期待，另一方面他又深為現實中的人事所困擾，在他看來，他沒有得到一個更能施展他思想和能力的陣地，或者說他不能忍受在那些他所瞧不起的同行（對手或同路人）手下做事，他所想要的是一個能施展他和他的朋友們的才能的舞臺，而不是一個僅僅是享受生活待遇的閒職。譬如在稍後的10月4日的家書中，他

說：「艾青忽然問我肯不肯到清華教書，並且說已向清華提到過，云。我說不能教書。看來，也許是想我閒居在此拿一千多斤小米的。在這樣的時代，我不想在這樣學府教書……」

在 10 月 28 日的家書中，胡風又說：「留我，是要我在文化部下面掛個名，住在這裏，這等於把我擺在沙灘子上，替茅部長象徵統一，如此而已。前天，給父周去了一信，表示希望能見面之意。但我看，不見得約見的。面對面，他難於處理。如不能出去，又弄不好，那麼，也許不久我就回到破屋子裏來。太平犬，從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們是得到了的。不過，是犬，總不會有太平日子，時不時難免有人提幾提棍子。那時候，見怪不怪也就是了。」

這裏，胡風筆下的茅部長就是茅盾，父周是指周恩來總理。在胡風的家書中，經常出現的有兩個「周」，一個是「父周」，就是周恩來，另一個是「子周」，就是周揚。還有一個經常出現的詞是「秘書」，指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從這信裏能明顯讀出胡風的情緒，其實那一時期的胡風家書，瀰漫其中的就是這種情緒。他與周揚在 1930 年代上海「左聯」時期的矛盾是公開的故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胡風的情緒之所以不滿，主要的原因與周揚及其同志有關，其時周揚的身份是新中國文學界的主要領導，而作為「左翼」文人尤其是「七月詩派」領袖人物的胡風，在面對周揚具體領導的文壇，其為「爭取」工作的心情可以用極端敏感和強力奮爭來形容。

貳

從 1949 年 9 月 8 日到 1950 年 2 月 4 日，這段時間胡風在北京除了開會就是為了解決他的工作問題，這期間他寫給梅志的家書裏，充分表達了他的期待和不滿。作為一直在「國統區」從事「左翼」文學活動的代表性人物，胡風對新中國的成立無疑充滿著自豪和期待，但新中國成立後看著昔日的「左翼」戰友或對手大多都有了相應地位置，

這位置或多或少在胡風看來並非是這些人應該取得的，尤其是胡風感覺自己明顯遭到了排斥，他的失望甚至哀怨油然而生。他在北京的日子，到了最後就成了等待和胡喬木甚至周恩來的見面，彷彿見了面他就能談清楚自己和周揚等人的矛盾所在，就能說明他和他的同道們的正確和周揚們的錯誤。譬如他在 11 月 8 日的信裏說：「現在是，等父周約見。好像子周想我在文聯或文協擔個名義，以示一統，也為他們掙場面。我並不是不願使他滿足，無奈這樣一來，等於使我躺在沙灘上，麻痹了我又對大局無益。這情形，非找父周徹底談一談不可。昨天雞尾酒會上見到，他說，我還沒有約你談話呢。可見他還記得要約見的。我看也許要拖到丁玲回來，由她來和我多談閒天的。」

胡風在北京除了參加會和一些活動外，用他信裏的話說，每天就是想想事，找人或人來，寫信。當然也寫些文章。如在 10 月 15 日的信裏寫道：「這幾天逼寫紀念文章，只好寫點短小的，不寫又要得罪人。……我答應了多留些時，一個月兩個月都可以，但不願在此工作。當然還要談話的，我只想談清楚了再回上海，好好地自己做一兩年再說。多留些時，也不致牽入上海的旋渦裏去。復旦事，再問你時，你可以答應，說等我回來後決定。」胡風說的復旦事，仍是不願意到大學裏教書，至於「上海的旋渦」是指當時華東地區文學藝術界的領導和組織事務。從胡風的家書裏不難看出，他不僅對周揚這樣的昔日論戰的對手，就是對同與周揚有過一些「過節」的「左翼」戰友如馮雪峰、丁玲等人也是頗有微辭。

胡風所說的「逼寫紀念文章」是指紀念魯迅的文章，緊接著的 16 日的夜裏，胡風完成了一篇四千餘字的〈不死的青春〉。讀胡風的〈不死的青春〉，很難想像是在這樣的情緒中寫出的，通篇洋溢著一個戰士的豪情和詩人的激情。譬如：

力量總是從存在著的力量產生出來，生長起來的。

……魯迅底戰鬥開端，或者說人民革命派底戰鬥開端，那內在的根據當然是在歐戰期間中國資產階級底勃起和同時俱來的無產階級底發育和覺醒，但對魯迅成人民革命派說來，不管在邏輯性的主觀認識上如何，卻是誕生在無產者這一邊，滿懷著勞動人民底火熱的渴求，帶著初生的集體主義的精神衝上前線的。

……然而，既然是人之子，那就當然不是神之子。他還要和戰鬥同發展，他的集體主義的精神還要和戰鬥一同發展的。

戰鬥，一邊是友，一邊是仇。

對於仇，要「睜了眼看」，愈看愈清，愈看愈深，他自己曾經用譬喻說過，像希臘神話裏的巨人，熱烈地擁抱他的敵人，為了把他摔死；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為了「反戈一擊，易致強敵的死命」。「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以對於敵人的認識和憎恨來養育自己，壯大自己。

對於友，對於人民，要「革命之愛在大眾」，要「看地底下」，追求「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吸取露，吸取水」；為了得到身內的新陳代謝，因而才能夠「擠出的是牛奶，血」。

那麼，對於自己，臨到需要執著什麼的時候，臨到需要割棄什麼的時候，還能夠不「心悅誠服」地順著集體主義的要求的麼？

他自己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的解剖我自己。」